



孙中山



上

世界

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 林家有 主编
广州近代史博物馆 李明

SUN SUN SUNHAN

YU

吉林人民出版社

SHI JIE

孙中山与世界

林家有 李 明 主编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与世界

主 编:林家有, 李 明 责任编辑:陈余齐

封面设计:吴 明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21

标准书号:ISBN 7-206-03346-6/K·191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000 册 定 价:52.50 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前言

2004 年是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亲自创办的黄埔军校、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80 周年。为了弘扬孙中山爱国革命、振兴中华和重视文化教育、培养建设人才的精神，中山大学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决定于 2004 年 7 月联合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与世界（含共产国际）”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学者与会，就孙中山与世界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和研讨，以利于孙中山研究向更深和更广泛的方向拓展，使孙中山这位世界性的杰出人物的研究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出现更多更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孙中山研究已经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研究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随着新材料的发现，以及研究者水平的提高和方法的更新，可以预见未来的孙中山研究一定会向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方向前进，研究的问题一定会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也一定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高。我们祈盼着全世界的学者共同努力，促使孙中山研究及其成果与这位世界伟人、世纪伟人的地位相称。

为了使国内外的学者更全面地了解“孙中山与世界”这个课题研究的现状，我们从近 10 余年来发表的有关文章和论著中选编出若干具有新观点新材料的国内外孙中山研究学者的

成果，编成这本《孙中山与世界》。本书由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编，由于时间仓促，加上对国际上外文杂志发表的孙中山研究成果了解不多，故选编难免会有精品遗漏，只好请有关的学者谅解。选入本书的论文为保持原貌不做删改，只有个别文章的题目和文字略有改动。注释一律改为页下注，所选的论文均注明出处，未注明出处的属未刊稿。在此成书之际，我们对为本书提出宝贵意见的各方人士、以及提供被选论文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谨致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编者

目 录

编者前言	1
孙中山亚洲观论纲/陈锡祺	1
孙中山与亚洲新兴国家的民族振兴/胡春惠	13
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桑 兵	25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世界和平/林家有	49
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	
——论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观/黄 彦	79
孙中山从联美到联俄	
——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必然效应/梁碧莹	133
历史的选择	
——孙中山联俄政策新探/徐万民	154
孙中山张作霖的关系与《孙文越飞宣言》/邱 捷	174
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	
——孙中山及国民党镇压广州商团的原因及其 影响/敖光旭	188
澳门:孙中山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张 磊	218
英国对孙中山选择革命的影响(1895—1896)/ 〔澳大利亚〕黄宇和	239
美国政府眼中的孙中山先生	
——以美国与“南方政府”的外交关系为中心/ 苏嘉宏 王呈祥	301
论孙中山与法国政界的关系/〔法国〕巴斯蒂	316
借助新的档案资料重新探讨孙中山	
——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对德态度/〔德国〕费 路	334

孙中山亚洲观论纲

陈锡祺

孙中山是一位气魄宏伟、眼光远大的革命家，他在领导中国的同时，始终注视世界大势的发展，尤其关注亚洲问题。他足迹到过亚洲不少国家与地区，与亚洲各国的朝野人士有过来往，逐渐形成自己的亚洲观。孙中山的亚洲观，概而言之，是亚洲在世界上地位的认识，振兴亚洲的思想、方针和策略等。下面谈谈我对孙中山亚洲观的一些简略的看法，以就教于方面。

19 世纪下半叶亚洲的局势，特别是中国的局势，是孙中山亚洲产生的客观条件。

鸦片战争使中国丧失了大国的声威。从此外敌凭陵，危机四伏，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衰落不是偶然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清朝乾、嘉以后，已到了末路，封闭社会，凋敝的经济，落后的科技，中国无论从国力到思想意识，无法对付挟有坚船利炮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原来与中国近的一些国家曾奉中国为宗主国。清政府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虽谈不上有多大的控制力，但通过册封、朝贡等活动维持“朝上国”表面的地位。到了近代，清政府既无力保护自

己，更无力保护别人。这些奉中国为宗主的邻国，相继沦为英、法、日等国的殖民地。中国的衰落也不是个别的现象。自文艺复兴以后，资本主义在西方逐步发展壮大，经过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的发展都大大超过东方国家。印度、土耳其、波斯及阿拉伯各国等亚洲国家，无一例外都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欺凌，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到19世纪末，在亚洲地区，只有日本一国真正拥有完全的主权，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日本在羽毛未丰之际，也就开始欺凌、侵略邻近的亚洲国家了。这种局面，使中国和亚洲各国的忧时愤世之士，都认真考虑挽救自己国家危亡的问题。由于面对的敌人很强大，因此，亚洲各国志士在斗争中逐渐加深了认识，明白亚洲各国联合互助的必要。而孙中山，则是亚洲各国革命领袖中特别杰出的一位。他的亚洲观有着典型和特别进步的意义。

孙中山的亚洲观，是他在探索救国的道路和领导革命的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亚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亚洲各国包括日本的志士的思想活动，对孙中山的亚洲观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孙中山在青少年时代，受过较为系统的西方教育，在檀香山、香港等地生活和学习过。他较之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大势有较多的认识。他在1894年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初步确立推翻清廷、创建共和的目标，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怎样“振兴中华”？在当时，就是要阻止外国对中国的“蚕食鲸吞”、“瓜分豆割”，就是要迅速改变中国“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的状况。这实际上已反映了日后他的亚洲观的一些要点。此后，他为了领导中国革命而环游世界，但他的足迹，以到亚洲国家与地区为多；到欧洲、美洲时，他也着重在华侨中开展工作，并与侨居

或暂留该地的亚洲人士交往。这些经历，使孙中山对欧美白种殖民主义者压迫、歧视亚洲人的状况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了解。他逐渐把争取中国独立和争取亚洲各国独立、振兴中华和振兴亚洲联系起来。孙中山的亚洲观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可以认为，经过孙中山 1896 年伦敦被难后在欧洲的一系列考察、学习、思考以及广泛接触各种人物，在三民主义形成的同时，他的亚洲观也基本形成了。一批日本人士，例如宫崎寅藏、萱野长知、梅屋庄吉、平山周、犬养毅、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和池亨吉等，对孙中山亚洲观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和促进。尽管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如头山满）后来暴露出侵略其他亚洲国家急先锋的面目，但其中的另一些人（如宫崎寅藏），则是真诚地想帮助中国和亚洲国家振兴的。不过，与孙中山交往的日本人士的复杂性，难免会对孙中山的亚洲观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孙中山和很多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有交往。据彭西记述，1898—1899 年前后，孙中山住在横滨平民区一间小屋，却谋划全球的事务，认为亚洲各国显露出的问题与现象固各不同，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斗争是共同问题。孙中山在那时成了东方——中国、日本、印度、暹罗、朝鲜、菲律宾等国的青年志士的热诚教导者。各国的革命运动是互相支持、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孙中山影响亚洲各国的革命者，亚洲各国的革命者同样以他们的理论和行动影响孙中山，向他提供各国争取独立斗争的信息，鼓舞他为中国、为亚洲而奋斗。现在我们知道孙中山与菲律宾的彭西、越南的潘佩珠、朝鲜的朴泳孝、土耳其的默尼汗等人都有过交往。这些交往，无疑有助于孙中山亚洲观的形成。

孙中山有句名言：“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他的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他的亚洲观也不断在革命实践中丰富，成为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孙中山在自己的著作、演讲和谈话中，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方式阐述过自己的亚洲观。他的亚洲观的产生，是以亚洲的历史、文化、人口、政治现状等诸种因素为基础的。孙中山的亚洲观，概括起来，有下面一些要点：

第一，基于对亚洲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认识，孙中山对亚洲的复兴充满信心，他认为亚洲的复兴是一种必然趋势。他说过：“我想我们亚洲就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在几千年以前，我们亚洲人便已得到很高的文化。就是欧洲最古的国家，像希腊、罗马那些古国的文化，都是从亚洲传过去。”^① 亚洲的衰落只是近代的事。亚洲一定可以复兴，亚洲复兴的转机已经出现。

第二，在孙中山看来，振兴亚洲是亚洲人自己的责任。亚洲各国必须同心协力，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各国的独立，进而争得整个亚洲的复兴。他反复强调：“亚洲大局维持之责任，应在我辈黄人。”^② 在很大程度上，孙中山把亚洲国家反抗西方国家的斗争视作黄、白人种的民族斗争。当然，所谓黄白人种的斗争，是一种很笼统、甚至是不科学的说法，因为白种人不等于殖民主义侵略势力，黄种人的日本在走上扩张主义道路后，其行径与欧美列强并无二致。但从近代历史来看，亚洲国家的衰落是西方国家侵略的结果。所以孙中山的说法也有其合理性。孙中山承认当时亚洲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他又认为，以儒家仁义道德学说为核心的东洋文化要优于西方文化。孙中山对东西文化的比

① 《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1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页。

较，自然有很多不严密的地方，但是，他强调对东方的“王道文化”对抗西方的“霸道文化”，其本质是要反对侵略，反对民族压迫。他希望在推翻西方国家在亚洲的统治以后，建立一种各国和平、平等相处的世界新秩序，任何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处。这些论点，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孙中山的某些幻想，另方面也反映了孙中山宽广的胸怀和远见卓识。孙中山面对当时世界强权政治的现实，在提倡东方“王道文化”的同时并不反对民族自卫和民族革命的武力斗争。他说：“不过对于欧洲人，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就要诉诸武力。”^① 孙中山一生都在斗争，也努力支持亚洲各国以武力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只不过孙中山把武力视作不得已才采用的手段。他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而亚洲在这个世界中有着应有的地位。

第三，孙中山把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复兴亚洲的第一步。这是孙中山亚洲观一个基本点。孙中山知道，“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中国人富于聪明才智，中国又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明，中华文化曾对世界、特别是对亚洲起过巨大影响。中国一旦振兴，就可以对亚洲、对世界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自青少年时代即已决心献身救国事业，他数十年间奋斗不懈，以救中国为职志，直到生命弥留之际，仍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但孙中山从来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知道中国人民的解放有赖于其他国家人民的支持，而支持其他国家的解放也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孙中山看来，由于亚洲国

^①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8页。

家地理相近，命运相同，亚洲各国应联合一致，而中国应在亚洲这个大家庭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1897年，孙中山在同宫崎的多次见面时就阐述了自己先救中国再振兴亚洲的志向：“拯救中国四亿的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只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均可迎刃而解。”^①因此，他始终把救中国和振兴亚洲联系在一起考虑。彭西说过，对孙逸仙来说，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放在一起研究的。^②孙中山还有一个可贵的思想，就是他认为，即使中国处于强国的地位，也只有用仁义来感化、帮助其他亚洲国家的义务，而不会用“霸道主义”欺凌其他亚洲国家。孙中山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一无例外地予以同情，“济弱扶倾”是他对待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关系的一个原则。孙中山的亚洲观，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有价值的思想——“天下为公”，对于中国来说，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总之，不能只着眼于本民族的地位和利益，而应该把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世界各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考虑。

第四，孙中山的亚洲观，特别注重“中日联盟”、“中日合作”。1924年4月30日，孙中山对日本广东通讯社记者说：“余企图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已三十年，因日人淡漠视之，遂未具体实现以至今日。”^③30年间，孙中山为实现中日合作尽了很大的努力，他把亚洲民族大同、团结计划不能实现，归咎于日本的态度，也从反面证实了“中日联盟”在孙

①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之梦》（中译本），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124页。

② Mariano Ponce: Sun Yat - sen—The Found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 40. Filipin - Chinese Cultural Foundation, Inc. Manila, 1965. p. 40.

③ 《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4页。

中山亚洲观中的重要位置。中国为亚洲人口最多、幅员最大之国，而日本则为最富强之国，两国的关系对亚洲以至世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日本与中国唇齿之邦，同种同文，对于东亚大局维持之计划，必能辅助进行。纵有些小龃龉，亦须顾全大局，不能成功。”^①他又认为，如中日友好相处，“能互为提携，则不独东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维持。”^②他在革命事业开始之初，即请求日本的援助。此后，他长期在日本进行领导中国革命的活动，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为中日建成平等、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1913年他访问日本，除了希望争取日本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新建的共和制、在经济上帮助中国建设实业外，就是谋划大亚洲主义，能与日本联合，把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驱赶出亚洲。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受尽日本政府的冷遇，一些日本野心家企图利用孙中山扩大在华权益。在实践中，孙中山逐渐看清了日本政府的真正目的，决不是为了振兴亚洲，而是为了侵略中国，侵略其他亚洲国家。所以，他对日本政府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当日本解除不平等条约以及在日俄之战战胜俄国时，孙中山很高兴，认为这是亚洲人的新希望。当日本吞并朝鲜时，孙中山毫不掩饰自己失望之情，认为日本此举“失亚洲全境之人心”。此后，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强占中国的青岛，支持中国的皖、奉军阀打内战和反对中国的民主力量，对这一切，孙中山予以尖锐的批评，从来无所顾忌，甚至表示不惜与日本一战。但他始终未放弃争取日本的努力，在极度不满之中仍怀有希望，在看清日本统治集团本质的同时，仍希望日本有识之士出而力挽狂澜。在五四运动中国人民民族情绪空前高涨的时刻，孙中山接见《朝日新闻》记者，

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页

一方面尖锐抨击日本政府短视的侵华政策，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民反日战争的正义性；同时，又希望“东邻志士”，“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确立日本立国之方针，不向中国方面为侵略”，这样东亚才有希望。^① 1923年孙中山回粤重组大元帅府，军务、政务万分繁忙，当年9月以后，他在戎马倥偬之际仍常与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谈大亚细亚主义，指出“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仿效欧美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是不像话的。日本应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真正的富有成效的中日提携。”^② 1923年11月，在广州保卫战最紧张的时刻，孙中山给老朋友犬养毅发出一封信，希望犬养毅趁入阁之机，发挥作用，“助吾人未竟之志，解决东亚百年问题”。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希望日本放弃扩张侵略政策，站在亚洲被压迫民族一方面，支持中国革命，承认苏维埃俄国。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仍不能忘怀于日本，在9月间派李烈钧赴日，“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的侵略”。同年11月孙中山北上，又特地绕道日本，在神户作“大亚洲主义”演说，最后一次公开呼吁日本与中国携手，协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还希望日本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勿做“西方霸道的鹰犬”。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所寄望的“中日携手”没有实现的可能。日本并没有改变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既定国策。

① 《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74页。

② 《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420页，引自俞辛焞：《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三

前面说过，孙中山的亚洲观是不断发展丰富的，我们可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界标，把孙中山的亚洲观分作前后两个时期来分析研究，从而探讨其发展变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孙中山亚洲观考虑的范围，从地域上说，主要是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多次谈到土耳其、阿富汗、波斯、印度和阿拉伯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在早期，孙中山曾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力支持东亚及东南亚的民族革命运动，如在 1899 年对菲律宾独立战争的支持，在民国初年对潘佩珠领导的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孙中山曾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尽管这些政权在外交上得不到列强承认，军事、财政处境都万分艰难，但孙中山仍没有忘记支持亚洲受压迫民族的斗争。1921 年，孙中山在广东接受了韩国临时政府特使申圭植的国书，谴责日本的殖民暴政。在 1923 年以后，广东革命政府容纳了许多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志士，他们在广东建立了民族革命组织、团体，准备返国发动斗争。一些朝鲜、越南志士也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实践上，孙中山支持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不仅一以贯之，而且也不断发展。

孙中山的亚洲观的内容，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他对问题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在早期，孙中山比较强调黄白人种之间的斗争，多从人种方面看待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十月革命后，孙中山逐步与苏俄方面建立了联系，他对世界大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 1923 年 11 月给犬养毅的信说到：“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说者多谓必黄白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

其必为公理与强权之战也。”将来世界的斗争必是“受屈者”联合以排“横暴者”的斗争。^①孙中山在看待国内问题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他关于国际间“受屈者”与“横暴者”斗争的认识，与列宁关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理论则有一致的地方。在后期，孙中山讲民族自决，明确主张扶持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强权。他认为，在被压迫者当中，亚洲人人数最多，亚洲人应当团结起来，反抗西方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②孙中山对日本认识的变化，也是他亚洲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孙中山后期亚洲观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对俄国认识的变化，而这种认识的变化则是由俄国本身的变化引起的。俄国地跨欧亚两洲，其居民多为白种人。沙俄一直是侵华最猖狂的国家，并始终支持中国最反动的势力。所以，孙中山谴责俄国，主张联日防俄。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宣布放弃沙俄攫取的在华权益，主张民族自决。孙中山经过研究，又与苏俄的代表进行接触，认识到苏俄的革命是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的希望。后来，他确立了联俄政策，主张“以俄为师”；同时，又希望日本与中国、苏俄结盟合作，以复兴亚洲。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亚洲观的一大进步。

孙中山生前并未专门论述自己的亚洲观，但综合孙中山各种论著、言行加以研究，仍可看出他的亚洲观是比较完整的，是他民族主义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孙中山的看法（如对日态度的某些方面）不能说都是正确的，但是，他的亚洲观，在认识水平上仍比同时代亚洲其他革命家、政治家有超越的地方。而且，孙中山的亚洲观，无论在当时还是日后，都对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① 《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3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5页。

亚洲的各界人士都高度赞扬孙中山的亚洲观。彭西说过，在菲律宾的独立斗争中，孙中山给予他们不可估量的帮助。^①彭西的评价，除了着眼于军事、物质方面以外，恐怕更看重思想、道义上的影响。日本的头山满称：“孙先生之功绩，非特欲求中国之富强，其求亚洲民族解放之决心，亦未尝稍变。”印度的达斯说：“中山先生为亚细亚洲之精神领袖，不仅为中国之革命元勋；中山先生之死，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损失。”越南的路亨利说，孙中山“联合东方民族做反帝国主义运动，突开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一条生路。”朝鲜李晶夔表示：我们高丽受日本压迫，与中国被列强压迫无异，“正冀孙先生率领东方痛苦民族，一齐进攻，使远东民族得到脱离奴隶地位，何如大星忽去。望此后中山信徒，一律依照孙先生政策，努力进行。”^②以上这些人物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所起的作用虽不同，但他们对孙中山的评价却为不刊之论。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亚洲革命家、政治家。越南的潘佩珠毕生都景仰孙中山，他的著作“有的比较明显地打下了孙中山影响的烙印”，孙中山思想的进步发展，对潘佩珠也发生了影响。^③在孙中山逝世30多年后的1956年，印尼的苏加诺访问中国时，在演说中多次提到孙中山思想学说对他的影响，他说：“亚洲是一家的思想，第一次是从孙中山先生那里知道的。”^④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列宁就曾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的中国

① [菲] 马莉亚·路萨·卡玛盖伊：《两个民族主义者间的友谊：孙中山与马里安诺·庞斯》，见《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头山等人的评论均见伍达光：《孙中山评论集》。

③ [越] 章收：《孙中山与二十世纪越南革命的关系》，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④ 《人民日报》1956年9月27日。